

读史阅世

说史谈厝

脱离日籍台胞第一人

——林资铿和他的爱国主义家庭教育

□宫婉舒 王丽君 文/图

根据祖训,台中雾峰林家所有建筑正房一律坐东朝西,朝向大陆,以此告诫后人:不要忘记祖宗和故乡。其中,林资铿是载誉海峡两岸的爱国将军,其爱国之情、报国之志令人钦佩不已,而这样为国家、民族牺牲奉献的爱国主义精神也融入了他对子女的教育中。

国民革命军首位台籍将军

林资铿(1878—1925年),祖籍漳州平和,其先人渡海开拓,后发展为台湾的五大家族之首——雾峰林家。据《台湾雾峰林氏族谱》所记:“朝栋公之三子祖考名资铿,字季商,号祖密。”其祖父林文察受名将左宗棠重用,因战功卓著而官至福建陆军提督,亡故后被朝廷追封为太子少保,雾峰林家宅邸因此得名“官保第”之名;其父亲林朝栋曾参与中法战争台湾基隆之战,为击败法军立下战功,为保台卫国作出重要贡献。

林资铿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就是在雾峰林家“先有国,后有国,国比家大”的家风家训中萌芽、生长的。他积极投入抵御外侮、保卫台国的事业,变卖家产,秘密支持和资助岛内义勇军抗日,如罗福星领导的苗栗起义、张火炉领导的南投大湖事件、余清芳领导的噍吧嘒起义。

1913年,林资铿返回祖国大陆,活动于福建省内,并向日本驻厦门领事署申请撤销日本国籍,同时呈请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准予恢复中国国籍。同年11月18日,林资铿获内务部核发的“许字第一号”复籍执照,成为日后正式恢复中国国籍的第一位台湾同胞。

他坚持以实业救国,斥巨资在漳州、龙岩等地开办垦牧公司、疏河公司和牧场;也曾几次变卖田产,出资数十万两支持孙中山革命事业,被孙中山委任为闽南国民革命军司令,其后升任大元帅府参军等职,成为国民革命军中第一位台湾籍将军。

林资铿一生共有9儿6女,日常忙于民主革命事业的同时,也不忘在家庭教育中向子女灌输爱国主义思想。其子女在林资铿爱国品格的影响和教育下成长,日后皆积极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奉献力量,其中儿子林正熊、林正亨和女儿林双盼的革命生涯最为荡气回肠。

秉承林家百年来的血脉性格

林资铿对长子林正熊寄予厚望,努力将其培养为接班人,希冀其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林正熊是林资铿将军原配夫人杨嫦娥所生,字少密,又名志民,乳名阿炳。

林资铿担任闽南军司令期间,在漳州成立了闽南随营军校(这所军校的成立时间比黄埔军校还早5年),并且出重资从厦门海关聘请外籍军官来负责军事训练,聘请广州中山大学知名教授负责政治课,以此培养闽南军重要干



台中雾峰林家官保第

部。林资铿也让林正熊到闽南随营军校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林正熊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遵循父亲的教导,学习成绩始终名列前茅,军事考核还获得了第二名的优异成绩。

1925年,林资铿在漳州华安县境惨遭驻漳北洋军阀李厚基旧部师长张毅杀害。林正熊继承父志,担任国民革命军援闽总指挥第一独立梯团团长并第一路司令官,带兵奋战在扫除闽地军阀的第一线上,特别是亲自率兵击败了杀父仇人张毅所部,为林资铿报仇雪恨。

1927年的《汉文台湾日日新报》刊出一条题为“林季商被杀之后,令息正熊发愤复仇”的消息,称:“闻林氏子这回满腔烈血,志在复仇之举,罗设周密,谅可获达到目的。父仇已报,不但林家门之光,亦漳属一带人民之幸。广州政府各要人,视林氏后人有此勇奋义烈,大赞斯举云云。”

林正亨是林资铿的第五男,为三房郭玲瑜所生。《后汉书》中言:“夫修道者,度其实而动。动而不时,焉得乎?”林资铿对五子的出生充满欢喜,精心思考为他起名,寄托了顺利通达、万事亨通的心愿,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在未来大有抱负。而林双盼是比林正亨小3岁的亲妹妹,两人都出生在鼓浪屿官保第即林公馆。

父亲林资铿主张为国效力的思想教育奠定了兄妹俩一生的革命基调。虽然兄妹两人在父亲遇害后分隔两地(林正亨留在福建上学,母亲带着双盼回到台湾雾峰林家),但其革命生涯却最终紧密交织在一起。

子女承续父辈无上荣光

从小就深受父亲爱国情怀影响的林正亨,高中在厦门艺术专科学校求学,表现出了高超的油画天赋,希望掌握更多的文化知识和本领来报效祖国。

1934年,林正亨高中毕业,返回台湾后,被日本人的恶劣行径所激怒,与他的父亲林资铿一样反感和抵制日本的压迫和侵略。于是,林正亨在1935年再次告别母亲,返回祖国大陆,想要报考中国第一流美术学院——南京国立美术专科学校。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国难当头,林正亨毅然投笔从戎,自觉承担起父亲抗战救国的母志,考入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前身为黄埔军校),选择参军报效祖国,完成了从一个热血青年学生走向爱国志士的重要转变。

林正亨秉承了林家百年来的血脉性格和父亲的行武精神。军校毕业后参与昆仑关大战,血战突围,其后于1944年在重庆加入中国远征军,赴缅甸作战,死里逃生却身受重伤。抗战胜利后,在云南休养的林正亨,给已分别9年的母亲致去家信,乐观的精神跃然纸上,尤其充满实现父亲遗愿的昂扬斗志:“在这场神圣的战争中,我可算尽了责任,台湾的收复,父亲生平的遗志可算达到了。要是得知,一定会大笑于九泉。我的残废不算什么,国家能获得胜利强盛,故乡同胞能获得光明和自由,我个人粉身碎骨也是值得。”

林正亨休养结束后,终于在重庆与分离多

年的亲妹妹林双盼重逢相聚了。当年身处台湾的林双盼铭记着父亲林资铿的教导:“有国才有台,爱国先爱国!林家祖祖辈辈都是中国人,都是流血牺牲抗击外辱的英雄,绝不能做小日本的亡国奴!”她不甘忍受亡国奴的屈辱,便于1936年孤身一人离开台湾,从参加南京抗日救援会到报名进入第九后方医院,逐渐踏上一条明朗的红色道路,开拓了父亲的革命遗志。

1938年是林双盼革命生涯的春天,她在学校进步教员和同学的带领下加入了读书会,之后奔赴重庆,顺利和组织取得联系,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并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林冈”以作纪念。至此,林双盼从一个满怀民族仇恨的台湾女孩成长为一个具有共产主义理想和革命觉悟的新女性。世人认为,林资铿之第五女林冈是在闽台乃至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留名的杰出女性。

可以说,正是林冈的敏锐早慧还有政治觉悟,唤醒并坚定了林正亨的革命信仰,让他意识到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国真正的希望,才是为中国劳苦大众谋福祉的队伍。林正亨关注共产党,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真正接续上父亲林资铿的家国理想。

1946年,背负秘密党员身份的林正亨带领20多名台籍青年返回台湾开展一系列的地下工作,于1948年被捕,两年后在台北慷慨就义,时年35岁。他在遗书中对母亲写道:“我踏上父亲的道路——苦难与牺牲。这是崇高的品性和无比的光荣。妈妈您用不着悲伤,也不用为我担心。生要为责任艰苦牺牲奋斗,死是我们完成了责任。”

在给妻子沈保珠的遗书中,同样表达了追随父亲林资铿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保珠贤妻,临别怅然,今已矣。余为继先父遗志,为国家与乡梓十余年来流血流汗,为望国家日趋强盛,同胞得获自由幸福,余已尽心尽力。”并留下绝笔诗《明志》一首:“乘艇泛海临台湾,不为黄金不为名。只觉同胞遭苦难,敢将赤手挽狂澜。奔逐半生劳心力,千里河山不尽看。吾志未酬身被困,满腔余恨夜阑珊。”

林正亨最终以肝胆气魄血洒刑场,和父亲一同走向为国捐躯的爱国之路,是第一位在台北就义的台籍中共党员。而其妹妹林冈也一直跟随中国共产党步伐,成为1949年进入中南海的唯一一位台湾同胞。

晚清台湾抗日保台志士、爱国诗人丘逢甲之子丘念曾如是评价林资铿:“革命不难,舍富贵而革命为难;舍富贵而革命不难,能审国脉,辨忠节,而舍富贵以革命为尤难。台湾林祖密(林资铿)者,盖能此尤难也。”林资铿的子女深受爱国主义家庭教育的影响,积极投身于祖国的革命事业,为祖国的解放事业建功立业,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和振兴努力奋斗。在林资铿后代的身上,依然处处流淌着他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操之血。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闽台区域研究中心)

乡土琐记

顺昌宝山寺石构大雄宝殿

□孙群 丁逸凡 文/图

宝山寺坐落于南平市顺昌县大干镇上湖自然村海拔1304米的宝山峰山顶,始建于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又名宝灵庵、宝山庙、宝峰庵,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重修。

明代正德版《顺昌邑志》记载:“宝山在娄山都,峭拔秀丽,群峰次第而列。正峰绝顶一庵,梁柱椽瓦之类,皆断石为之。”清代重建山门、前殿、厢房、凉亭等建筑。寺庙坐南朝北,四周奇峰峭壁,森林密布,整体空间采用中轴线结合自由式布局,从南向北依次为前殿、大雄宝殿,右侧为偏殿、僧寮、斋堂等,右侧山麓处

有齐天大圣庙。其中,前殿与大雄宝殿围成一个四合院。因地处原始森林,宝山寺殿堂保存较为完整,其中大雄宝殿于2001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大雄宝殿又称祖师殿,建于1363年,明弘治十二年(1499年)进行局部修缮,清末进行换瓦,近年来国家文物局拨款150万元对大殿及周边建筑进行修缮。

大殿为花岗岩仿木构建筑,占地面积362平方米,门前有石坪,除两扇大门是木作外,其余构件均为石材,构件断面皆较粗大、敦厚,颇有早期木构建筑“肥梁胖柱”之特征,既有唐宋遗风,又具元代特色。大殿基座为高0.65米的单层须弥座,显示出较高的规格,正中设三级垂带踏跺,主角雕曲线纹,束腰刻莲瓣形壶门,门内浮雕狮子戏球、缠枝莲花、“卍”字纹等,中间以竹节柱分隔,具有强烈的佛教文化寓意。

大殿为悬山式屋顶,正脊脊刹置宝葫芦,鸱尾雕龙鱼,脊堵为实堵。屋顶举折较平缓,屋面铺设长约1米的石瓦,其中扣瓦压在仰瓦之上,不易被大风吹毁,两侧设博风板。抬梁式构架,勿上露明造,面阔5间15.8米,通进深5间12.35米,前后九椽椽,墙厚0.7米。明间开木门,次间、梢间辟直棂窗,大门两边置圆形抱鼓石,抱鼓石下端浮雕卷草纹,门臼雕刻成瓜瓣形。

前檐廊的檐柱与金柱之间横跨一根短粗的挑尖梁,次间与梢间的檐柱间以两根石条相连作为栏杆。采用抬梁减柱造做法,全殿共有28根椽形立柱,中间较宽,两头收缩,不仅美观大方,而且符合轴心压力的力学原理,与福州龙瑞寺大殿、泉州开元寺天王殿的椽形柱颇为相似,具唐宋时期立柱的特色。

内檐廊的挑尖梁做成月梁形,梁上置坐斗,斗上架短而较弯曲的割牵,向上承托柱椽条。明间九架椽,用4根高3.87米的立柱,前后两根立柱横跨一根五架梁,梁上置坐斗,斗上跨一根三架梁,特别的梁上置3个坐斗,斗上托住3条并排的椽条,近年来为了防止这根五架梁断裂,在梁底部加了两根立柱用以承托。

次间九架椽用5根立柱,左右立柱间横跨一根石枋。殿内的立柱、坐斗均出一跳斗拱。石柱础有双层素面、单层覆盆式和八瓣覆莲式共3种。殿内分隔成三间,明间与次间构成面积较大的正厅,梢间构成狭长的边厅,正厅与两边厅前既是连通的内檐走廊。

殿内脊檐下皮刻:“维大元至正二十三年

癸卯岁七月廿八乙未良日己卯时募众鼎建上祝”铭文,另外在椽、梁、枋、柱、榀牵和椽、瓦上阴刻有10多段元、明、清捐舍维修题铭。明间后金枋前侧阴刻:“当今皇帝万岁。”从这些铭文中可知,大殿主要是由附近信徒为祈福消灾而捐款兴建的,不仅有官员,还有普通民众,甚至包括在封建社会地位较低的女信众,反映了元代时佛教已十分世俗化。

这座元代大殿具官方建筑风格,其建造非常奇特。首先,以石材仿照宋末木结构建筑,形成较为完整的宋式木结构样式。石仿木造古塔在福建地区较多,如泉州东西塔、石狮六胜塔、福州乌塔、福清瑞云塔、莆田释迦文佛塔、仙游无尘塔等。但是石仿木造大型殿堂却极其罕见,多是一些小型建筑,如永泰名山室宋代观音洞佛龛、泉州弥陀岩寺元代石室、福清瑞岩寺元代石亭、泉州瑞像岩寺明代石室、南安石亭寺清代石亭等,而明代之前的大型石构殿堂唯此一殿。

其次,屋顶共有550片石瓦,重16吨,横梁跨度3.7米,屋面板直接压在椽条上,通过坐斗传到三架梁,后传到四架梁上,再通过两个支点到柱子上,最后再传到地基。通过这种力学传递方式,把重量逐层传入地基之中,使得大殿相当稳固。

再次,梁枋与柱子都十分硕大。因大殿所使用的石材为附近山上的砂岩石,坚硬度不高,容易剥落,用此材料建房易塌陷,因此加大截面,然后确定较为合理的梁的跨度、宽度与高度,采用中间大、两头小的椽形石柱。虽然宝山寺所用的砂岩石并不适宜建筑,但工匠们从设计到营造过程都相当用心,每个构件的尺寸都计算合理,把石构建筑与木构建筑有机融合。

大殿神位除供奉佛菩萨外,还祀有三济祖师和齐天大圣。三济祖师为闽北地区的民间俗神,分别为龚志道、刘志达和杨志远,其中刘志达为唐代人,本为僧人,歿后被封“普照真济大师”,后又加封“灵应真人”,成为闽越原始宗教闾山教的神灵。顺昌的齐天大圣信俗以猴神崇拜为核心,已被列入福建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因此,宝山寺大殿体现了我国儒释道三家文化与民间信仰的结合与交融,是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宝山寺大雄宝殿肃穆端庄,构造严密,结实大气,以精湛的建筑技术著称于世,是福建元代石构殿堂的瑰宝。

癸卯岁七月廿八乙未良日己卯时募众鼎建上祝”铭文,另外在椽、梁、枋、柱、榀牵和椽、瓦上阴刻有10多段元、明、清捐舍维修题铭。明间后金枋前侧阴刻:“当今皇帝万岁。”从这些铭文中可知,大殿主要是由附近信徒为祈福消灾而捐款兴建的,不仅有官员,还有普通民众,甚至包括在封建社会地位较低的女信众,反映了元代时佛教已十分世俗化。

这座元代大殿具官方建筑风格,其建造非常奇特。首先,以石材仿照宋末木结构建筑,形成较为完整的宋式木结构样式。石仿木造古塔在福建地区较多,如泉州东西塔、石狮六胜塔、福州乌塔、福清瑞云塔、莆田释迦文佛塔、仙游无尘塔等。但是石仿木造大型殿堂却极其罕见,多是一些小型建筑,如永泰名山室宋代观音洞佛龛、泉州弥陀岩寺元代石室、福清瑞岩寺元代石亭、泉州瑞像岩寺明代石室、南安石亭寺清代石亭等,而明代之前的大型石构殿堂唯此一殿。

其次,屋顶共有550片石瓦,重16吨,横梁跨度3.7米,屋面板直接压在椽条上,通过坐斗传到三架梁,后传到四架梁上,再通过两个支点到柱子上,最后再传到地基。通过这种力学传递方式,把重量逐层传入地基之中,使得大殿相当稳固。

再次,梁枋与柱子都十分硕大。因大殿所使用的石材为附近山上的砂岩石,坚硬度不高,容易剥落,用此材料建房易塌陷,因此加大截面,然后确定较为合理的梁的跨度、宽度与高度,采用中间大、两头小的椽形石柱。虽然宝山寺所用的砂岩石并不适宜建筑,但工匠们从设计到营造过程都相当用心,每个构件的尺寸都计算合理,把石构建筑与木构建筑有机融合。

大殿神位除供奉佛菩萨外,还祀有三济祖师和齐天大圣。三济祖师为闽北地区的民间俗神,分别为龚志道、刘志达和杨志远,其中刘志达为唐代人,本为僧人,歿后被封“普照真济大师”,后又加封“灵应真人”,成为闽越原始宗教闾山教的神灵。顺昌的齐天大圣信俗以猴神崇拜为核心,已被列入福建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因此,宝山寺大殿体现了我国儒释道三家文化与民间信仰的结合与交融,是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宝山寺大雄宝殿肃穆端庄,构造严密,结实大气,以精湛的建筑技术著称于世,是福建元代石构殿堂的瑰宝。

泉州洛阳街之兴衰

□陈德杉 吴峻峰

民国甲子年(1924年),洛阳街(在今泉州市台商区洛阳镇)开始拓辟马路,兴建骑楼,客观上,洛阳街的改造满足了近代城镇的规模要求,保留和激发了旧有的商业活力,尽管当地盘踞势力的目的根本还在于能以此攫取更多的税捐,且将人们引向其确定的社会空间,利用这种媒介的审美感染力和权势暗示力,得心应手地教化和控制地方民众。

毋庸置疑,骑楼建筑的层高、开间和装饰比普通的建筑要求均要高,只有在商业繁华地带才有可能出现。洛阳街古时属晋江县洛阳铺,与洛阳桥相连,俗称“三里街两里桥”,是厦门至福州的必经之道。洛阳水上交通尤为方便,在桥头、海尾及吴厝祠堂埋脚设有3个码头。从外地海运到洛阳的有豆饼、肥田粉、面粉、南北杂货、建筑材料等。邻近地区如南安洪濑、晋江市、惠安县城、东园、涂寨等地的商贩常来采购货物,运至各地销售。

洛阳古镇一派商业市井气息,时里三街街上密密匝匝地壅塞着杂货店、粮食店、绸布店、钱庄、当铺等,“福兴棧”“源利行”“万盛行”“长春行”“兴源行”“裕记”“吉和”等皆是盛极一时的名号。1922年8月就成立了洛阳商会,负责管理商户,解决商业纠纷,最早在中街的穆太爷祠内办公,至1924年,当时商会会长陈少谦召集地方绅士和主要商户商议,决定利用中街的忠烈祠(俗称“乌面宫”)改建为洛阳商会会址,并成立一个专门机构“中厦郊”,负责向各有关商户抽取从外地海运至洛阳销售的货物上水费,作为建设商会会址的费用。1925年会址建成,商会在楼上办公,楼下面仍供“三王爷”,让群众烧香礼拜。

清朝末期,洛阳街的店铺大多采用屋子远挑或搭架凉棚的方式,然中国建筑屋顶以榫架承重为主,屋檐出挑有其限制,而搭凉棚又嫌简陋,故无法满足不断扩大的商贸活动规模的需要。鉴于于此,两旁旧有的商舖参差不齐,当地盘踞势力明订布告,凡是沿街参差不齐、陈旧破败的商舖一律拆除,留足街道宽度,由舖户依据典型骑楼样式自行建造,高度统一为二层。五脚架不得用板壁、竹篾等类遮断及摆作什物,阻碍行人。部分拆除过多的建筑(或者原本即是空地)则重新建筑。一些临街寺庙、祠堂的门厅,也被强制拆改为传统式单层柱廊,不过则是与骑楼配合得体,连成了贯通的人行空间,如“张氏家庙”“王氏祠堂”“古井禅寺”等,至今仍存实可鉴。

骑楼兴筑的工程费用由临街舖业自主承担。有消极抵抗或借故拖延、阻碍骑楼施工进度者,则采取强制办法。在一定时期之内,无论各业主将房屋重建或重修与否,该舖业面前均须动工兴建;如不,即代为招租,而且所有费用由该业主于竣工后一定期限内连带本利缴还。另外,骑楼管理维护责任仍然由各业主负担。因此,路面如有损坏,须自行修复,否则亦会找人代工修理,费用仍须由业主支出。其间,往往要由商会出面,与各商户共商如何分摊负担、妥善解决。兴师动众好一阵子,这条骑楼街体系的于1928年大抵形成,“以退为进”的方式确也赢得了门庭若市的效果。

一言以蔽之,洛阳街的红砖骑楼主要是由地方盘踞势力、民间商会及本土工匠共同参与的结果。通过有秩序、有系统的规划方式强制性地推行骑楼建设,洛阳街这个传统的乡土社会便逐渐地转型为近代的商业社会。

洛阳街红砖骑楼彼此相连,浑然一体,所构成的建筑立面总体上是连续的,左右邻舍,看似重复又不尽相同,从而赋予了街道连续的韵律。老街为东西走向,蜿蜒迤邐,宛若游龙。生意人讲求风水,街曲则财聚,同时也增加了街景的变化,丰富连廊中的视觉体验。不如此也,街道的整体尺度更是经过一番斟酌,狭小未免拥挤、逼仄,空旷则易疏离松懈,洛阳骑楼街道的宽度在亲切距离范围之内,如此的尺度可以不断调节光线与阴影,是一处令人身心皆感舒适的趣味空间。

整个骑楼风貌被改变肇始于华侨的还乡叠楼,主要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大量华侨将传统光宗耀祖的观念延伸为跨村的乡社认同,当然也与炫富攀比的心态不无关系。譬如回村柱楣力模仿一些西方古典柱式,山花挑檐处追求更多的细节雕饰,透着一股精工贵气。在结构上使用钢筋混凝土,最明显的是将宝瓶栏杆折掉,“更上一层楼”,楼顶装饰巴洛克山花、南洋孔洞、印度教火焰山墙等。在材料的选择上,除了红砖以外,洋灰(坝灰)、洗石子及面砖开始大量使用。于是,齐整一律的二层红砖骑楼格局也就不免受到冲击。

迨至“文革”,这些华侨骑楼的许多立面被铲除,纹饰被破坏,不得见其原貌。大部分竟墙则被抹上水泥,改革开放初,绝大多数走廓又被店主封堵成自家的店面,无法穿行。嗣后又有大量骑楼被拆毁,给老街以致命的打击。新建筑东盖一栋、西起一间,见缝插针,五花八门,吞噬着历史上留存下来的一砖一瓦。

恣意拆建的楼房与老式骑楼形态格格不入,其间不乏粗制滥造者,简陋高突,不伦不类。楼底临街装上卷闸门,二楼窗户镶上铝合金,外墙悬挂着各种空调机,五颜六色的现代广告与隐约可见的红砖图案显得极不协调。一些楼顶加盖了住人小房间、铁皮隔热层,东凹西凸,高低不平,实在有碍整体观瞻。

诚然,一般民众何曾认真考虑过红砖骑楼的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他们追求的只不过是简单的实用功能而已,所以经常处于不可避免的审美匮乏状态,将骑楼视为乡镇发展中的淘汰品,诸多可观之迹已日渐式微。

近世以还,因时代更迭、住户迁徙,许多骑楼都是几易其主。笔者在田野调查中困难重重,难以一窥全貌,唯有仅存的几座红砖骑楼尚属完整,但也因年久失修,墙面及屋顶杂草滋生,疮痍满目,颇有凋零之感,令人痛心。至此,洛阳街那一轴充满民国情怀的红砖骑楼长卷已告昨日记忆。幸而近期已着手聘请国内外知名文创团队进行勘察设计,欲重振古街雄风。